·专题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1.015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三维探析

袁明月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摘　要]以五四运动为关键节点的五四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出场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得以快速传播并展现出真理魅力,是因为顺应了革命现实的需要、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期盼。从主要内容上看,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三个主要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理论武器。从价值意蕴上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完成了民族思想的革命性启蒙和蜕变、推动了开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伟大篇章。回顾和总结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出场逻辑、在场逻辑及其战略逻辑,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与方向。

[关键词]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革命运动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1-0169-1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接受,是我们把握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普遍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①,信仰、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须得找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逻辑起点,这本身也是探源真理的过程。以五四运动为关键节点的五四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时期,有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革命道路的转换。全面深入厘清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与方向。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②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和社会动荡之中。列强的侵略和领土的割据,封建主义的腐朽和专制体制的沉重束缚,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理论与机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3ADJ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全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建话语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2YJC710058)。

[作者简介]袁明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yuanmingyue2024@126.com。

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兴起为青年学子提供了探索国家前途的新视角和思想武器。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和借鉴,更是对中国革命现实需求的主动回应,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武装和组织领导,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时期与五四运动并非同一概念。狭义的五四时期通常指的是从1919年5月4日到1919年6月底,而广义的五四时期则涵盖了从1915年到1925年约10年的一段时期[①]。本研究采用广义的概念,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深远影响。

(一)天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顺应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

任何一种理论的传播都需要与之相契合的环境,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出场,首先要契合中国革命的现实时代步伐。在历史的沉重篇章中,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巴黎和会的连续挫败,加之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相继夭折,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民族、社会与国家的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一系列危机,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救亡图存之路变得尤为迫切。尽管社会上有识之士不断提倡并实践对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引进与学习,试图推动民族复兴,但无论是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还是文化层面的革新都遭遇了失败。究其根本,问题的核心在于思想领域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即使器物等层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思想的贫瘠使得这些进步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力量。

思想革新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政治革命也以思想革新为巩固基础。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变革往往为政治革命奠定理论和舆论基础。只有当民众的思想发生转变,认识到旧制度的不合理性时,政治革命才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通过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全面批判,打破了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人特别是受到新文化熏陶的青年学生对西方模式的幻想,使他们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②]。在深入探索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也逐渐洞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深刻本质,并对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他们同帝国主义开始彻底对抗,同封建主义开始彻底决裂,同官僚资本主义开始划清界限。这一认识的深化,不仅标志着知识分子对剥削压迫阶级的认知从模糊到清晰,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也预示着中国革命的策略和方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现实境况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1920年,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③]。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让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苏维埃政府随之建立,让人们看到中国革命新希望。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从"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的"主义"之争中,越来越清晰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革命的道路逐渐明朗。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西方"舶来品",其漂洋过海舶来之际,就是在彼时中国和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化时代化过程。而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犹如"一道灿烂的红光普照神州大地"[⑤],使昏暗、混乱、羸弱的中华大地开始觉醒。五四运动的胜利,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适应中

①张允熠:《"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学术界》,2019年第5期。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④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

国国情的，它的先进性与正确性在中国具体的实践中得到了高度认可。

（二）地利：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坚实保障。在经历了国内外多次革命与斗争后，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承担起指导革命进程的历史使命。作为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团结领导广大群众推翻帝制、封建制度。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也奠定了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注入了新的力量，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干部准备。二者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石和行动指南。这一选择不仅标志着中国革命理论的重大飞跃，也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生产关系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核心原理，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本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将这些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沿着什么方向革命”等关键问题，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与理解，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进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五四思潮的引领感召下，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汇聚起来，为党的成立做了干部方面的准备。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①]。五四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中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潜在的革命力量，积极投身工人群众中做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发动工人阶级要“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②]，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不断增强，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自觉不断增强，建党目的和指导思想不断明确，并在实践中不断回答了“为什么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党”等根本问题，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激荡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尚在创建初期，却已发挥着中流砥柱的引领作用。党积极构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框架，如成立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和发展早期党组织等。这些组织犹如星星之火，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据点。以毛泽东在长沙的实践为例，他创建的文化书社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能够以书籍为媒介，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部分工人群众中传播开来。俄罗斯会研究则重在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为中国的进步人士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参照，让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巨大力量，从而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入群众进行动员。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尤为突出，一大后毛泽东在湖南大力发展党组织并创立众多工会组织。共产党人深入工人中间，以深入浅出的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等理论，使长期受压迫的工人认识到自身困境的根源，从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解放的思想武器。同时，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积极进行理论宣传，李达等人在各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阐述其对解决劳动者剥削问题的根本意义，加深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且，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明确的思想导向，引领工人罢工走向胜利，全国罢工高潮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已被广大工人阶级接受，这一系列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保障。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②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总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坚强保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从组织建设、群众动员、理论宣传到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接受提供了坚强保障,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人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回应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期盼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只有当人民群众愿知愿信与自觉自为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武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期盼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过去数千年封建主义时期,中国传统社会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和劳动分配、偏向特权阶层的法律和伦理规范,以及限制普通民众教育机会等方式压迫民众。这种压迫导致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当矛盾无法通过现有体制解决时,往往引发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新的统治集团上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集团可能重蹈覆辙,变得腐败和专制,社会矛盾再次积累,形成权力交替和暴力革命的怪圈。这种循环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局限性。这种压迫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尤为明显,当时国家正深陷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重危机之中,民众生活于贫困与压迫之中,基本生存需求与生命安全均得不到保障。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民众的呼声日益高涨,迫切寻求新的思想与出路以实现自我解放。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冲击激发了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深切渴望。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更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指引,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仅在思想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更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价值。作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群众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信念,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变革和发展。对五四时期的中国进步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但促使他们思想产生质的跃升,更重要的是促成他们整体发生了革命转向,成长为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性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②]同时,他们意识到自身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更应是中国革命的推动者。进步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既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也伴随着革命实践的过程。

"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③]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努力践行和检验马克思主义,由传播者逐步转变为坚定信仰者和革命实践者,马克思主义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马克思主义思想让中国革命获得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同时又全面提升了革命决心和战斗力。进步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开展有针对性的探究,各种"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而社会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将其他各类主义一时间的影响力都比了下去。基于对此类问题的不断探究,真理逾辩逾明,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进步知识分子还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以往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析,中国革命由此获得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经验,确立了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策略,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信心,更有效地增强了革命的集体力量和斗争效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②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③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

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结构严密、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其学理科学深奥且自成一体。这一理论体系在中国五四时期的传播中，对那些渴望国家振兴与民族复兴的志士仁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被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理论所吸引，这些理论的真理性和彻底性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指南，也为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核心理论不仅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也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首先被传播和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唯物史观。”[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唯物史观因其解释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本规律，阐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驱动历史进程的核心观点，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理解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新视角，因此在早期传播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②]它以人类社会的变迁运动、人类历史发展等客观规律为重点研究对象。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推动，其中经济的繁荣和物质基础的增强扮演着核心角色。经济基础不仅塑造了上层建筑，还决定了历史上所有制度的变化。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③]然而，中国社会的封建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现代化步伐。封建体制下，农业占主导地位，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导致农民生活困苦。同时，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加剧了对中国的掠夺，使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这些外部压力和内部剥削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经济，民族工业发展滞后，经济危机频发。这种不公平的经济秩序激发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意愿，他们渴望改变现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知识分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后也认识到，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前提和实现国家强盛的关键，这为后期党领导土地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阶级斗争与社会变革是唯物史观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阶级斗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的变革与矛盾激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可能性。同时，农民阶级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剥削，参与革命运动。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革命思想的传播，青年学生也逐渐意识到国家的命运需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与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引着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强调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高阶级意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五四时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这种背景下，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共性规律。只有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阶级解放，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进步和发展。这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社会基础，更实现了从机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发现”：一个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④]。它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本

①陶德麟，何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③《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页。

质,昭示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源,也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依据。受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影响,马克思关注资本主义不平等,尤其是工人贫困问题。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合作研究政治经济学,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为马克思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使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之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触及工人创造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情况。在《哲学的贫困》与《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进一步分析了工资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1867年,剩余价值理论在《资本论》中进一步地得到系统完整的阐述。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最为直观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与剥削,他从阶级角度出发,以生产方式为研究方向对当时社会经济学作出了综合的、全面的研究,从根源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先天弊端,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契机:"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①]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指出资本家通过延长工时、压低工资等手段,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剥削本质。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标志着他思想正式转向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剩余价值理论发挥了解释框架的功能。例如,封建制度下,地主凭借土地所有权,以地租、捐税等手段榨取农民辛勤劳作的大部分收益,这是对农民剩余价值的剥削。这种剥削关系导致了社会资源的不公分配,进一步加深了贫富差距,使得社会发展陷入了困境,同时也成为五四运动中农民觉醒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与殖民,中国的经济结构逐渐被迫转向资本主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凸显。工人们长时间的劳动换来的却是微薄的报酬、恶劣的劳动条件、低下的生活水平。这种剥削不仅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也使得工人阶级对现存制度产生了强烈不满与反抗情绪。同时,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的主要力量,也遭受着双重的剥削与被剥削。工人阶级被资本家剥削压榨,而知识分子则在封建统治下受到思想言论的压制,限制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活动空间。这使得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他们积极参与罢工、示威等活动,呼吁社会变革与民主自由的到来。在五四运动中,人民不满于传统社会秩序下的剥削与不公,深刻感受到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压迫本质,激起了对不合理现状的愤怒和呼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和阶级觉醒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斗争思想的源泉,也是我们党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法宝。李大钊曾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三个部分:过去的学说(唯物史观)、现在的学说(剩余价值理论)和将来的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③]如果仅仅依靠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些方法论,缺少了阶级斗争的实践转化,"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④]。

①《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5页。

②《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③《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9页。

④《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7页。

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对阶级斗争的深刻洞见，又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印证，使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要想彻底打破中国的困局，彻底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消除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消灭社会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维护民族利益和无产阶级切身利益，就必须展开阶级斗争。“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①]“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②]毛泽东1941年曾经谈到，自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中，主要依赖三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指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而作为指导阶级斗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同样“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④]，深刻地回答了斗争为了谁、依靠谁、谁领导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宝贵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⑤]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22次提及“斗争”。

青年学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他们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主意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率先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学生们罢课、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这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直接挑战。他们的斗争目标明确，一是要夺回被帝国主义掠夺的国家主权，二是要打倒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卖国贼。虽然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相对软弱，但在思想和舆论上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在阶级斗争理论下，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上海等地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他们罢工的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工人阶级的罢工使得五四运动从单纯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的罢工涉及到铁路、矿山、纺织等多个行业，直接影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经济利益。这表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工人阶级通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阶级意识进一步觉醒。马克思主义为工人阶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使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陈独秀等。这促进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价值意蕴

在五四时期特殊的中国国情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蓬勃发展。作为一种具有解放性思想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解决方案。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既有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质疑，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实践和传播下，人民群众思想逐渐开化，认识逐渐清晰，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在思想革命与传承上起到了改天换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是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2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9页。

④《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年4月25日第1版。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80页。

文化和价值理念,二是完成了民族思想的革命性启蒙和蜕变,三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伟大篇章。

(一)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过程,也是通过承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融入中国文化语境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的重大论断,随后,"两个结合"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社会欢迎和接受是同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具体实际需要相契合,那么,马克思主义"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②]。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相似的理想愿景和相通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是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分化、消除劳动异化,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世界大同。1899年,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见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编译的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社会进化》,发表在《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作名称就是《大同学》,彼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统称为"大同学"。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也是建立大同社会,《礼记•礼运》就有对大同社会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倡导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毛泽东青年时期以言明志:"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③]。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立场,面向人的本质需求,实现人类的自由解放,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强调"民胞物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强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仁政""民惟邦本,本固邦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注重整体思维,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本质上固有的天然亲和性和耦合性,为两者的相伴相生和同源共进提供了条件。思维方式的相通性又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时,能够运用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接受,也逐渐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观念,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相结合,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新需求。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忠君爱国观念逐渐转变为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的道德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人人平等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的上下尊卑观念也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反对剥削和压迫,倡导废除封建等级制度,追求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同样,马克思主义认为伦理观念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一认识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中"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探索如何在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公正的伦理秩序。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新时代背景下得以转型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0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二）促进了全社会的思想启蒙，促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更加意识到封建道德规范所带来的种种局限性，开始积极寻求新的思想路径。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和重建，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逐步形成了以社会发展进步为导向的思维方式，推动了民族思想的转型升级，激发了人们追求民族自立、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为中国社会思想的革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五四时期以“五四运动”为节点，分为前后两个半程。五四时期的前半程，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坍塌后的价值权威“真空期”，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认同异常紊乱和脆弱，基特尔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等各种“主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①]，“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②]。在这种境况下，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成立，让中国民众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力量，人们开始觉醒、奔走呼号，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时代的“显学”，焕发出勃勃生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贯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条主线，同时也是五四后半程的主要内容，它带动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广泛的思想文化革命”[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封建思想的冲击和颠覆，使得民族思想经历了革命性的启蒙和蜕变过程。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与西方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觉醒的民众向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发起的挑战，后者是崛起中的资产阶级为了政治利益发起的一次思想总动员，两者出发点不同、发动力量相异，结果也迥乎不同。在此之前，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但它“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④]，人民革去了头上的“辫子”，但没有放下心中的“皇帝”，愚昧腐朽的封建思想依然占统治地位，这是当时人们最大的“心魔”。

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和广泛传播，引爆了启蒙临界点，加速了启蒙进程，突破了全盘西化和唯心主义、封建主义的启蒙限度，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性启蒙新时代。因它开启的是“救亡之蒙”，恰逢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符合中国民众的思想期盼，拨开了困惑整个社会的价值迷雾，呼应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顺应了救亡叙事的时代要求，最终实现了由思想启蒙转化为精神觉醒，兼具了实践性与革命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引领辐射下，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等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广泛接触、学习、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由少部分先进分子的“先知先觉先导”，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知自觉自明”，实现了由器物到思想文化“物心”两面的觉醒。“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⑤]，最终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彻底觉醒，中国人从此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根基由此奠定。

（三）推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篇章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民思想觉醒与解放，推动了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与吸收，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新思想的指引下，人们开始审视传统观念并勇于挑战旧有观念，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思考，从

①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版，第399页。

②梁启超：《梁启超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③张顺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模仿西方到自主探索。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实践中,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思维方式也逐渐变得理性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拿起理论武器的人民逐渐认识到自身担负的历史使命,找到了正确方向、坚定了信念。他们努力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和改革中,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接受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一理论体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思考和创新,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地开展研究、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为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真正动力源泉。中国人民不仅获得了文明和现代化的科学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与价值也不断深化和延展。这一探索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体系,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指明了方向,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模式。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的理论创新,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的新变化。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在世界多元文化交织、思想思潮交锋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渐为世界所关注和借鉴。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新征程上,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回眸百年,五四时期不仅解决了中国社会形态过渡的问题,“五四”更意味着对现代化的追求,代表着因此而开启的现代化运动,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进入和中国化时代化传播,才有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启蒙和蓬勃发展,才有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键节点,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起点上,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面临着国内、国际多重挑战,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系统回顾和总结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历史出场、主要内容及价值含义,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责任编辑:杨　旻]